

■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2.001

高等教育研究何为(笔谈)

张应强, 阎光才, 韩延明, 罗志敏, 戴平, 汪恽

摘要:2025 年是杨德广教授从教 60 周年,我们组织本次笔谈以致敬这位为我国教育事业奉献毕生的教育家。杨教授六十载躬耕教坛,其学术生涯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紧密相连,从提出“教育产业”“教育市场”思想到推行“充实教育”改革,再到倡导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始终以“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的信念回应时代挑战。本次笔谈汇聚了 6 位专家学者的不同视角,系统梳理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智慧,提炼对当下改革的启示。专家们一致认为,杨教授是敢于争鸣的学术先行者,在“高等教育适应论”辩论中捍卫教育规律;是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家,通过“充实教育”改革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更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倡导者,主张兴办“超常”学校以释放人才潜能。其思想与实践,为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

关键词:学术争鸣;知行合一;充实教育;钱学森之问;拔尖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G122;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2000313

从一场学术争鸣谈杨德广教授对我的启发

张应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在庆贺杨德广教授从教 60 周年之际,我向大家介绍杨德广教授参与的一场学术争鸣及其对我的启发。

一、敢于开展学术争鸣:杨德广教授的学术风格

杨德广教授的学术风格是将工作、学习、研究有机统一起来。研究以工作为中心,结合工作学习,对工作、学习的心得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工作。他善于学习、敏于学习,对新思想、新理论保持着高度开放性和敏感性。他始终立足本职工作实践,基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回答和在现实上解决

修回日期:20251208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养课题“科技强国背景下大学创新体系一体化构建研究”(25YJRC010ZD)

引用格式:张应强,阎光才,韩延明,等.高等教育研究何为(笔谈)[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2):315.

Citation format:Zhang Yingqiang, Yan Guangcai, Han Yanming, et al. What shoul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pursue(pen talk)[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6,14(2):315.

高等教育工作实践中的问题。他重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提出创新性理论观点,然后用理论指导实践,提出解决方案,解决现实问题,他的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极具务实精神的高等教育研究。

杨德广教授的学术风格,最为我敬重的,是敢于开展学术争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学术争鸣非常少见,人们往往瞻前顾后,不敢开展学术争鸣,缺乏学术争鸣的勇气。杨德广教授思想敏锐,敢于开展学术争鸣。有学者称他是“探索高等教育真知的争鸣者”。他认为教育工作者要讲真话,不唯书、不唯上,一心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讲真话,是他的学术责任和学术担当。他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争鸣文章,很有力度和批判性,不怕自己的思想遭到抨击。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就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必须改革,要实行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提出了“改制”是我国高等教育摆脱困境的出路。他较早提出改革大学生“统包、统配”制度,顶住各方压力,最早在全国召开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把计划分配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将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制度引向人才市场。1987 年,他还提出要“变大学办社会”为“社会办大学”,大学要与社会加强横向联系,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来共同办好学校。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杨德广教授将潘懋元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主动适应论”思想具体化,率先提出了发展教育产业的思想观点,并陆续发表了《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的转轨变型》《关于建立教育市场的思考》等文章。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他的观点,甚至围攻他,但他坚定地认为教育产业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好恶,认为只有发展教育产业,才能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发展教育产业的必要性、合理性和重要性,而且以之指导办学实践,提出了“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的办学理念,用上海师范大学的改革实践成果回应来自高等教育理论界的质疑。

潘懋元先生对杨德广教授予以高度评价。他在 2020 年庆贺杨德广教授八十华诞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指出:杨德广教授思想开放,常以批判性思维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提出许多超前的创新见解。杨德广教授有些观点在当时不为一般人所认同,如关于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的理念常有非议,但他坚持正确见解,反复说明论证。他好辩善辩,不唯书不唯上,他的论文多是针对错误或者保守的言论而慷慨陈词的。

二、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问题的学术争鸣

高等教育主动适应论,是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重要内容。潘先生提出:教育一方面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另一方面,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需要,并主动为之服务。1985 年 5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这个方针,既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一方面,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转到依靠教育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是我国将教育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性地位,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源头。

2013 年,有学者发表长篇文章,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概括为高等教育适应论,否定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提出高等教育要摆脱“适应论”的思想束缚,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杨德广教授不认同该文的观点,他将写好的题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吗?》的商榷

文章给我,希望在我负责的《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鉴于那篇文章是在另外一本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我建议他将文章拿到该刊上发表,这样更有针对性。

杨德广教授在文章中基于世界高等学校职能的演变和发展、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及我国的教育方针,系统论证了高等教育的“适应性”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历史误区”。他指出,高等教育的“适应论”是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对推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从实践论角度对教育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揭示,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他认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不是理论演绎得来的,而是从我国教育改革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他指出,原文作者用哲学上的“认知理性”概念来演绎教育规律,将“认知理性”提高到高等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不适当的,据此来否定和取代高等教育适应论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存在方法论重大缺陷的。杨德广教授的文章在该刊2014年第3期发表后,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和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学术讨论和争鸣。

三、杨德广教授对我的启发

杨德广教授的重要思想观点,对我研究教育规律问题具有重要启发。这些年来,我在有关文章和著作中专门研究了教育规律的性质,讨论了教育规律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我认为,教育规律既是教育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与教育改革实践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教育规律虽然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和实践特质。教育规律与教育目的密切相关,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要正确理解教育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问题。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不同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现象不同于客观自然现象,它是因教育实践活动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因此,教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

实际上,科学规律也不等于自然规律,科学对规律的揭示,也是一个逐渐逼近自然规律的过程。理论物理学家海森伯在《物理学和哲学》一书中指出,我们所观测的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他据此提出了“测不准定律”。袁振国教授通过对古代哲学家关于“第一哲学”的追寻、经验科学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现象学的挑战的历史回顾,提出了规律是确定性与概率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自由意志与群体选择、“规律”与“规则”等多元统一的论断。

在杨德广教授学术观点启发下,我在阅读了不少关于教育规律研究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将教育规律研究方法概括为两种:一种是经验科学的教育规律研究方法,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我认为,研究教育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将教育看作人类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以实践的观点看教育,要立足教育实践来揭示教育规律,而不是基于所谓的“认知理性”来演绎教育规律。我们研究教育规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一种关于教育规律的理论认识,而是为了指导教育实践。教育规律源于实践,最终要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检验。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需要,并主动为之服务,是潘懋元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深刻反思我国教育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教育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揭示。

近年来,我在潘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教育规律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认为教育规律包括教育发展规律、办学治校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们要特别注重研究教育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九个坚持”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科学概括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有机统

一,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指导和根本遵循,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和教育目的,全面把握教育的三大属性,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办学治校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理解和认识。

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德广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长,也是专业委员会目前的名誉理事长。在他担任理事长期间,正值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飞速发展时期,面对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各种新形势与新问题,在始终坚守潘懋元先生学术立会宗旨的前提下,他以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眼光,组织专委会开展了众多带有前瞻性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研讨。诸如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保障、大众化阶段民办高等教育与女性教育、现代大学精神与教育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和高等教育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教改革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议题。与此同时,他还以“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学科建设与发展”为题,在全国组织了多次研讨,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尚处于不断壮大中的学术共同体,专委会由最初的年会规模几十人发展到今天的 700 多人,如果说潘懋元先生是学科的开创者与领路人,杨德广先生则无疑是潘先生所倡导理念的继承者与发扬光大者。正是在两位前辈的倾心培植与精心呵护下,经过后续几代人特别是张应强名誉理事长的再接再厉,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成长才有了今天百花齐放的样态与枝繁叶茂的盛景。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学科先驱与学术榜样,更是激发我们以家国情怀、政策与实践关注、现实问题意识、理论建构取向去投身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精神感召。

一、著作等身的学者

在如今这个时代,对于一个人的成就,人们往往喜欢以贴标签的方式来凸显他的贡献。然而,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放在杨德广先生身上并不适切,因为每一个标签都不足以彰显他的贡献与成就。他是我们高等教育学领域德高望重的学者,几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学术思想与观点涵盖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构、大学德育、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现代大学治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如此等等。虽然是一位资深学者,但他的学术思想与观点总是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既具有先锋性又带有审慎的反思与批判性,始终充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与充沛的思想活力。从早期倡导在坚守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整体效率,推动差异化办学特色形成,到主张高校的去行政化,探索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再到推动高校“宽进严出”的招生制度改革,强调尖子人才培养,如此等等,都无不体现了他思想观念的时代性与学术观点的超前性。

二、知行合一的教育家

他不仅有着理想的情怀与丰富的教育思想,更是一位以深度理论研究为支撑的务实和智慧办学

持续推动教学改革,扩大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强调充实教育;想教师所想,急教师之急,他以现代大学校长最应具备的公共关系专家角色,广泛筹措资源,解决了教师的住房困难问题;以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育人理念,全力推动绿色校园建设,彻底改变了校园生态环境,让上师大成为沪上最美校园之一;在办学过程中,他大胆探索引入市场化改革,发展教育产业,拓宽了学校经费渠道和大幅扩展了学校的办学空间,为学校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宽容仁厚的先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一位师者关爱年轻人的风范。在我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杨德广先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我们的授课老师,因此我对他作为师者的风范有着切身的体验。即使在今天,30年前他为我们上课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不仅理论知识渊博、高校办学与管理实践经验丰富,而且富有思想见地与批判精神,思维活跃,每堂课都以接地气的睿智见解为我们带来思想的启迪。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他包容的胸怀。杨老师如今可能已经不记得当时的一些片段与场景,他在课上曾批评当时博士论文动辄言必称古希腊迂腐,以及论文篇幅越写越厚的现象。带有书生气的我们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公开忤逆,但他从来不以介怀。他主张观点可以不同,但尊重师生之间关系的民主与地位平等。作为师者,他对学术后辈的包容胸怀与仁厚之心,时时刻刻的褒奖与庇护,其影响何止于一时的激励,而是延续到整个职业生涯。

四、胸怀大爱的慈善家

杨德广先生还是一位有大爱的慈善家。在70岁时,他将平时积累的100万元讲课费、书稿费以及卖掉1套房共300万元,捐赠给了他就读过的小学、中学、大学3所母校,随后追加捐赠200万元设立慈善基金,资助有经济困难的品学兼优学生。由杨德广先生发起创办的“阳光慈善教育基金”,已经让数千名西部家庭困难学子受益。

在杨德广先生身上,学者、师者、教育家与慈善家,不同角色都可谓做到了极致,它们相互交错叠加,才能构成杨德广先生的完整、立体和全面的形象。“慈善之星”“中国当代教育名家”“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这些荣誉,对他可谓实至名归。在他本人,这些角色的确让他的“读书梦、图强梦、教育家梦、慈善家梦”等梦想成真,达成他矢志追求的“立德、立志、立业、立言”的人生目标。但对我们而言,则不啻一座一生期求却难以企及的高峰。

善作善成的人民教育家杨德广先生

韩延明

(临沂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德广教授有句座右铭:“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确实,作为一名高水平的领导干部和高贡献的专家学者,理应在人生事业发展中敢作敢为、亲力亲为、大有作为,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这就是“善作善成”。“善作善成”典出《史记·乐毅列传》,意谓既要善于做事,更要善于把事做成。笔者认为,“有思想、有理论、有实践、有成效、有影响”的杨德广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作敢为、善作善成的人民教育家。所谓“人民教育家”,是指深谙教育规律、热爱教育工作,具有独到的教育理念和学术见解,创新性地全身心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杰出教育工作者。其特质有四:一是传承

者,薪传与播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自然文化;二是育人者,从事并深爱教育工作,耿介拔俗、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三是创新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并创新教育教学工作,踔厉骏发、踵事增华;四是奉献者,淡泊名利、任劳任怨,天下为公、无私奉献。

一、杨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教育改革家

杨先生曾先后荣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当代教育名家”“新中国 70 年 70 位教育人物”“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等荣誉称号,这从一个侧面映照了他多年来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作为在我国教育改革开放初期勇立潮头、敢于发声的教育管理者,他于 1978 年率先在《文汇报》上撰文,首次向全国发出“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教学领域中去”的呼吁;1980 年在《人民日报》首次提出“高校要推行计划管理与合同管理相结合”的方案;首次提出人才培养要“产”“销”对路;最早提出“变大学办社会为社会办大学”;最早提出“供需见面”的毕业生就业制度;较早建议“创办一批民办大学”;较早主张“高校去行政化”“取消高校等级制”;较早倡导“建立老年教育学”;较早呼吁“建立创业型大学”等。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大潮,他敏锐地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三个主动”,即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主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主动建立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他秉持改革创新理念,说真话、说实话、敢说话,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富含开拓精神的真知灼见,为高校走出“象牙塔”、迈进“大社会”、逐步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言献策。笔者作为新时期的大学校长,对其“既要找市长又要找市场”的管理思想感同身受、获益匪浅。此外,杨先生先后提出并建立了 10 项高校教学改革制度,即教育学分制、核心课程制、课程选修制、学分替换制、分流培养制、教材分层制、中期选拔制、鼓励冒尖制、宽进严出制、差生淘汰制,在学生管理中大力推行多张证书制、干部轮换制、半年实习制、综合测评制,并首次在上海师大接收盲人学生入学就读,被誉为“教改先锋”。杨先生深入研究并创新提出的诸多教育改革理念和实践方略,为推进我国高校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了独树一帜的重要贡献。

二、杨先生是一位学思结合、笔耕不辍的教育理论家

至 2025 年 10 月,杨先生已从教 60 载,出版专著 50 多部,发表论文近 600 篇,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获奖 20 余项。他乐于学习、善于思考、勤于写作。由于他一直从事管理工作、公务繁忙,其著作和论文大多是利用每晚挤出两个半小时和双休日、节假日写出来的,而且是一笔一画在稿纸上“爬格子”写出来的。他每天用于学习、工作、写作的时间有 16 小时,而且 40 余年如一日,可谓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他创新性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论”“立体德育论”“教育产业论”“教育市场论”“充实教育论”“超常教育论”“大学生文明修身论”等,影响深远。他胸怀坦荡、无欲则刚,无论是在教育教学、高校管理方面,还是在后勤改革、学生就业方面,都敢言直谏、求真务实,并多次与专家学者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进行商榷、论辩,理性研判、站位高远。据统计,除从事正常的管理、教学、科研、写作之外,仅 1982 年至 2019 年,他就在 197 所高校、47 所中小学、152 家教育机构、10 所党校作各类专题报告 2 004 次,其中 2003 年退休后至 2019 年有 1 146 次,确实撼人心魄,甚至令人不可思议。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饱含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因为这不是流水线机械作业,而是实实在在的手工制作,想想都觉得吃惊、都觉得心疼、都觉得像是神话一样的存在。

三、杨先生是一位知行统一、敢作善为的教育实践家

多年来,杨先生专心致志研究教育理论、殚精竭虑谋求教育发展、创榛辟莽开拓教育创新之路,接

地气、重行动、求实效、知行合一,是一位勇于探索、执行力强、敢于啃硬骨头的优秀高校管理者。其教育人生,既是一部个人发展奋进史,更是一部中国教育启示录。早在1992年,他就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大学德育论》,走在了“立德树人”的前列。1996年他到上海师大担任校长时,学校经费拮据,赤字达1500万元,教师住房紧张、待遇偏低,大楼年久失修,教学设备老化,校园水道不通,每逢下雨便积水成潭,导致教职工情绪低落、怨声载道、积极性不高。鉴于此,他依据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现实,提出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改变教育困境。他大胆改革,取消福利分房,成立房产公司,要求各单位“全方位为基础教育服务”,主动承担起全市幼儿园、小学、中学教师培训任务,发展成人教育、大专自考班,举办研究生课程班,并从市区向郊区、中西部地区辐射,送教上门,当年学校财政收入达一亿元,之后逐年递增,显著改善了办学条件和教职工待遇,仅2000年就有1075户教职工喜迁新居,但他却没拿一平方米的住宅。他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和校园环境改造,带头捐款和参加义务劳动,大力开展植树种花活动,使大学校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四季飘香,被评为“上海市花园单位”“全国绿化400佳”。后来,他又在政府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依据经济学“成本分担理论”,通过市场运作机制(贷款、置换、集资、融资、BT模式等),力排众议开发了占地面积约1800亩的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目前在校生达2万余人。他先后在3所大学任职校长16年,始终密切关注青年人的价值观教育和人生发展,注重课堂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人格育人、慈善育人,如今依然以耄耋高龄生龙活虎般奔走于教育领域和西部地区,为培育时代新人而从事教学和阳光慈善活动。可见,杨德广先生用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在“呼啸着前进”中成就了他的教育梦想和人生辉煌。

四、杨先生是一位心怀大爱、舍己为人的教育慈善家

杨先生曾多次讲过,他一生有4个梦:一是读书梦;二是图强梦;三是教育梦;四是慈善梦。退休之后,他用卖掉自己住房的200万元,加上多年来省吃俭用的积蓄,积攒的稿费、讲课费、获奖费、养老费等100万元共300万元作为基础,开启了为社会做慈善公益事业的新征程,设立了“杨德广励志奖学金”和“阳光慈善专项基金”,迄今已资助贫困家庭优秀生12000余人,成为“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实践。2012年之后,他带领阳光慈善团队筹集200万元,帮助甘肃、四川贫困小学生解决营养午餐问题,有4000余人受助。2015年至今,这位浑身充满爱的阳光慈善老人,共筹集900多万元(其中本人捐130多万元)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的15所高中设立“阳光优秀生”奖,每人奖励2000元,共有4000多名学生获奖,其中90%考取大学。2020年,他给南京慈善总会捐赠200万元;2025年,给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捐赠100万元。荣膺“上海慈善奖”和“中华慈善奖”。《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杨先生的“大德敦化”情怀和“大爱无疆”行动,令人崇敬。

杨德广“充实教育”理念与实践

罗志敏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德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也是高等教育行动研究的大家。他不仅是一位很开明、勇于担当、很有开拓精神和能力的高教管理者,也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思考能力的研

究者。从教 60 年来,杨先生在科研、管理、育人等方面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或者“首次”:第一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结合论”;出版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大学德育问题的学术专著;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高校“计划外管理”论;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高等教育的“三个主动”论等。在诸多贡献中,杨先生于 30 年前提出并成功实践的“充实教育”理念尤为突出,为当时破解高校育人困境提供了重要方案。在当前我国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重温这一理念,对于深化高校内部治理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充实教育”的提出背景

杨先生提出“充实教育”,源于其对 20 世纪 90 年代高校现实的深切忧思与教育家的责任担当。当时高等教育仍属精英阶段,但大学校园中已出现令人担忧的“松、散、懒”现象。杨先生在 1996 年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后,通过暗访发现,学生课余时间多用于打牌、看电视、闲聊,潜心学习者寥寥,考前则依赖复印笔记应付考试。这种状态暴露出学生在跨越高考“独木桥”后陷入目标迷失、动力匮乏的“理想间歇期”,教育资源面临严重浪费。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即将到来。杨先生预见到,扩招后生源多样化、学习动机差异加大,将使学风问题更趋复杂。社会转型中的功利主义思潮也侵蚀着学生的学习观,加之一些教师教学投入不足、方法陈旧,“水课”与“懒学”形成恶性循环,教育质量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一局面,杨先生深感责任重大,认为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唤醒学生,引导他们在实践中重拾学习意义,从而催生“充实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二、“充实教育”的核心思想与行动框架

“充实教育”绝非简单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而是一个从外显行动到内在觉醒的系统育人体系。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从行动破局,以充实育人”,即通过有组织的行动参与,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由内而外地唤醒自我成长动力。这一理念具体化为 3 个相互支撑的实践维度:其一,充实教育内容,构建“活”的知识体系。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大幅增加高质量选修课,推行辅修课程、多证书制,打破学科壁垒,让学生能根据兴趣与规划自主选择,使知识学习变得生动、可应用。其二,充实课余活动,搭建“动”的能力平台。系统设计学科竞赛、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如“半年实习制”)及“学生干部轮换制”等活动,引导学生将课余时间用于能力锻炼与社会参与,从“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其三,充实精神生活,塑造“强”的内心世界。指导学生进行“自我设计”、加强时间管理,实施将品德、实践等纳入评价的“综合测评制”,引导学生追求全面发展,在价值实现中获得精神满足,点燃持久的内驱力。

三、“充实教育”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在上海师范大学,杨先生通过一系列制度化设计,探索出了一条在办学规模扩张中保障育人质量的有效路径:一是多张证书制。鼓励学生在主修专业外获取各类技能与竞赛证书,拓宽能力边界,增强就业竞争力;二是学生干部轮换制。确保每位学生在学期间均有担任干部的机会,培养责任意识、服务精神与领导能力;三是延长实践实习制。将师范生实习延长至一学期,非师范生实践达 10 个月,深化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提升职业适应力;四是综合测评制。建立涵盖德、智、体、美、能的多元评价体系,并与评奖、升学、就业挂钩,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五是专项活动与教学优化。开展科技、体育、艺术等校园活动,组织社会实践与公益劳动。同时推广优质教学案例,要求教师严格教学、培养学生的自

学与表达能力。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校园风气焕然一新,学生从“闲散空虚”转向“忙而有序”,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毕业生也因扎实的专业基础、突出的实践能力和复合型素质广受用人单位好评。

四、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杨先生的“充实教育”理念与实践,对当下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多方面启示。一是教风建设方面,强调教风对学风的引领作用。当前高校仍存在教师教学投入不足等问题,需通过制度保障与人文关怀,在评价和激励中切实体现教学价值,促使教师安心从教、深耕课堂。二是教学改革方面,确立“以学为中心”原则。应优化课程体系,增加学生选择权。同时,改革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评价与能力考查,推动“水课”出清、“金课”涌现。三是管理制度方面,倡导“宽进严出”与分流培养。严格学业标准、实施合理分流,是保障教育质量的关键。同时应依据学生多样需求设计差异化培养方案,确保人人尽展其才。四是育人导向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实践育人体系,让学生在服务社会、创新挑战、团队协作中锤炼品格、提升素养,实现知行合一。

杨德广教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戴 平

(上海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触及教育界的软肋,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杨德广《高等教育研究,何为》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答。

一、要注重早期“超常”儿童的选拔、培养

杨德广认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如何选拔人才,二是学校如何培养人才。”他提出“要从人的儿童时期就开始选拔和培养,尤其要着力于早期‘超常’儿童的选拔和培养”。何谓超常儿童?杨德广提出,古今中外一直有“超常”教育,但对“超常”儿童的称呼不尽相同。中国古代有“神童”一说,认为特别聪明和有才能的儿童是“天神”所赐。外国则有“天才”之说,认为禀赋极高的人是先天遗传的,是上帝赐予的,故称“天才”。杨德广以为,“超常”儿童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遗传因素,在智商和身体素质方面,遗传基因有一定的作用;二是后天环境,一个人能不能“超常”,也取决于后天的作用,包括教育、环境影响和个人的努力。

二、美国培养拔尖人才的经验与启示

杨德广以美国培养“超常”儿童的材料,为回答“钱学森之问”作例证。在19世纪末,美国开始对资优的学生作个别教育的尝试。时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学校的校长威廉姆·哈里斯提出:“为有天赋且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提高学习进度。缩短教学课程。”自此开创了美国天才教育的先河。1901年,美国第一所天才儿童专门学校建立。1954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科学基金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天才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要求联邦政府给地方拨款进行资助。

杨德广认为,美国教育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着力于对3%~5%天才儿童的培养。美国对拔尖人

才的培养之所以比较成功,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承认有“超常”儿童和天才青少年的存在,对其因材施教,给予特殊待遇;二是重视法治建设,以法律形式为培养部分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保障与支持;三是加大资金投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基金会,都会拨专款支持天才教育的研究和实施,并形成了一支具有培养天才儿童能力的专职教师队伍,其结果是美国政界、经济界、军界、科技界的杰出人物,绝大部分来自二三十所美国顶尖大学。

反观中国,我们的“超常”教育则存在严重的不足,传统的“均衡论”(不患寡而患不均)依旧在发挥负面作用。有些人仍认为培养拔尖人才是在搞特殊化。超常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没有被教育系统充分关注,这就使那些试图为超常儿童提供特殊教育的努力,得不到政府的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只能以“实验项目”的方式谋求进展,能够覆盖的学生数目很有限。应试教育在中小学里大行其道。“公平论”“分数论”像一根绳索捆绑了教育界和许多天才儿童的手足,以致我国超常儿童的大多数还没有得到相应的特殊教育服务。此外,社会及教育系统对天才儿童的期望都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缺少服务的意识和人文的关怀。事实上,天才儿童有各种类型,每个人也有其优势与弱势,而且和所有的儿童一样,他们也要经过从身、心的不成熟逐渐向成熟发展的过程。因此,他们的成长也需要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帮助,而特殊教育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 1.56%,1998 年仅为 9.6%,直到 2002 年才达到 15.03%。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后期,入学率在 48% 以上,每年招收 700 多万大学生,完全可以将 3% 左右的“超常”学生选拔到尖子班或英才班,给予特殊培养,但在“教育公平”的声浪中,许多有望成为杰出人才的学生,被淹没了。高校是培养未来精英的阶梯。目前我国正在加紧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中国教育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一个开发式的教育模式。比如从幼儿园到高考,一直要你死记硬背,并没教你怎么去开发、去推翻旧框架并创造出新东西,而这正是我们教育体系中的一大弊病。

三、甩掉“应试教育”这根指挥棒

学生缺乏创造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应试教育这根指挥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社会基础,科举制度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模式。为了在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绩,大多数中学围绕高考这根指挥棒,从初中开始要求学生“刷题”,尤其是数理化,分门别类、总结题型,甚至有些学生会选择高强度地死记标准答案,知其然而无暇求其所以然。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有创新和开拓精神。

我国教育界对此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1976 年,李政道给中国科学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教育,得到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1978 年,江西赣州出了一个天才少年宁铂。2 岁半背诵毛泽东诗词,8 岁熟读《水浒传》,9 岁吟诗作赋,12 岁下围棋,和方毅副总理对弈,连胜两盘。方毅建议开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推荐 13 岁的宁铂破格入学,成为全国瞩目的小大学生。但他不喜欢物理,1979 年申请转学至南京大学天文系未果,成绩平平。宁铂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 岁成为全国最年轻讲师,改学理论物理后又转入星象学与宗教研究。2002 年赴五台山出家,据说佛学讲得还不错。2018 年,宁铂还俗,研究佛学,做心理咨询研究。由于对宁铂的培养出现一些曲折,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对中科大少年班的非议。

其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培养了不少高级尖端人才。和宁铂同一批进校的少年大学生有

20 人,年仅 14 岁的初中生申喻参加高中数学竞赛,提前 1 小时交卷,却夺得第一名,入中科大三年级时,发现并修正了大学线性代数教科书中一类定理证明的错误,引起数学界重视。谢旻现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郭元林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据 20 年前统计,中科大少年班创办 27 年,共招收 1 134 名少年大学生,在毕业的 942 人中,85% 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取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 生,300 多人获得博士学位,并涌现出如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亚勤、被授予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 奖”的卢征天、被誉为“纳米博士”的秦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等国际知名的杰出人 才,说明少年班的成才率和成才度都是很高的。杨德广指出:“我们国家不缺千里马,而缺识千里马 的伯乐;中国不缺‘超常’人才,而缺选拔人才的机制;中国不缺金矿银矿,而缺开发意识和能力。只 有树立高度责任感,才能培养出‘超常’的杰出人才。”他建议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创办“超常” 学校,有条件的小学、中学都要办英才班、特色班。这样,我国的精英人才将会如井喷一样涌现出来, “钱学森之问”也将迎刃而解。

杨德广教授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启示

汪 恽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杨德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长期以来,他坚持工作、学习、研究紧密结合,围绕高等教育理 论、教育管理、大学德育及教育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引起教育界的瞩目。在杨德广教授 教育研究、探索中,超常儿童、拔尖人才培养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才培养、人才开 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拔尖人才培养的内涵

基于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杨德广教授指出,在青少年中是存在尖子人才、“天才”的,即接受能力 特别强、思维能力特别强、记忆力特别强、“脑子”特别好的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分层次的。英才 是高层次人才,居于金字塔的塔尖,是人才大军中一支“特种部队”,有卓越的创造能力,是人才资源 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源质量的关键要素。

二、拔尖人才培养的突破举措

(一)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是重视拔尖人才培养。杨德广教授指出,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发展高度、从人才培养 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举国上下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着力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尽可能把青少年儿童中有潜质的超常学生、天才学生及早送到优质学校培养。二是善 待“超常”儿童和学生。杨德广教授认为,必须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抓起,善于发现“超常”学生,着 力实施“超常”教育。第一,认识早期性。抓住“超常”儿童和学生的成长关键期,抓住时机、节点和拐 点,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及时培养和训练,促使他们快速成长。第二,承认差异性。杨德广 教授认为,必须承认差异,尽力把超常学生、天才学生选拔出来进行培养。第三,敢于超常规。要采取 超出常人、超出常规的培养方法,突破一般学校的招生、培养模式。三是正确对待教育平等、公平、稳

定的问题。杨德广教授反对“把超常学生、天才学生集中在优质学校培养是不公平的”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平等、公平主要指受教育机会公平和平等,不可能人人都能进优质学校。只有通过竞争考核,选拔优质的学生入学,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是符合优胜劣汰规则、符合因材施教规则的。如果不让优秀学生反而让差生、问题学生进优质学校,那才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二) 加快拔尖人才培养

一是大力创建“超常”学校、“育英班”“英才班”或“尖子生班”,完善入学条件、选拔制度、办学规则、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师规范、学生守则等方面操作办法,制定筛选制度、淘汰制度、退出机制,确保真正有发展前途的“超常”儿童能进入这类学校和班级学习、深造。二是制定“超常”儿童的选拔标准和操作办法。要制定和完善智商指数测量表,专门设置测试点,选拔“超常”儿童。对于专特长的学生,偏才、怪才学生,可进行专门的考核测试。同时,不搞“一锤定音”,在校学习半年、一年后再进行考核。不合格的转入一般班级或其他学校,让优质学校成为优质学生展现自己才华的竞技场。三是建立多元人才培养体系。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特长、特点,尤其是一些怪才、偏才,为学生创造适合其成长的最佳环境,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每所学校都要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因材施教。学校应创造多种多样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环境、教育方法,满足学生多种多样的需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促进拔尖人才的健康成长。四是改变学校评估制度、管理制度。不能只看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论文数量,还应看在校生及毕业生质量,看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拔尖创新人才。

(三) 创设良好环境

一是加快立法进程。制定有关超常教育、天才教育方面的法制条例,给予超常教育、天才教育的法律地位,为超常教育、天才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二是设立管理机构。杨德广教授建议教育部门设立英才教育管理机构,专门管理超常教育、英才教育、拔尖人才培养,并且把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列入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条例、考评办法。三是营造社会氛围。杨德广教授建议在有关全国性学术组织下设立专门性的研究会、联盟、协作会等研究机构,搭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鼓励和引导企业、基金会、社会贤达积极扶持、资助,营造良好氛围。

三、几点启示

人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关键动力、引领力量。杨德广教授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是更加突出战略意识。拔尖人才培养的问题,不是教育或者人才领域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问题。从杨德广教授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必须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视角,敏锐洞察国家人才培育与发展的战略需求,关注人才发展的现实关切,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专业智慧、作出理论贡献。

二是更加突出问题意识。拔尖人才培养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从杨德广教授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既直面我国人才培养“平而不尖”的核心困境,又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思想、实践、制度等多重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践导向,建构研究逻辑链条,为拔尖人才培养破局提供了精准靶向。

三是更加突出突破意识。拔尖人才培养的问题,不是人才培养中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具有突破胆识、敢于打破常规的难题。在现实情境中,拔尖人才的培养,受到思想的限制,制度的束缚,甚至还牵涉各方利益的纠葛,因而导致拔尖人才的培养,远远跟不上强国建设的需要,跟不上科技

创新、产业变革的需要,跟不上赢得国际竞争的需要。杨德广教授在拔尖人才培养领域的探索,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突破意识,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教育观念的革新,更体现在对固化制度体系的挑战与重构,为新时代拔尖人才培养提供了“破局”思路。

(责任编辑:蔡宗模 校对:杨慷慨)

What Shoul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Pursue(Pen Talk)

Zhang Yingqiang,Yan Guangcai,Han Yanming,Luo Zhimin,Dai Ping,Wang Yi

Abstract:2025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Yang Deguang’s teaching career. To honor this educator who has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cause of education in China, we have organized this written symposium. Throughout his six decades of diligent work in education, Professor Yang’s academic journey has bee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reform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From proposing the concepts of the “educatio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market”, to implementing the “enriched education” reform, and to advocating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he has consistently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with the belief that “action is meaningful only when grounded in a higher purpose”. This written symposium brings together six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offer diverse perspectives,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his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al wisdom, and extracting insights relevant to current reforms. The experts unanimously agree that Professor Yang is an academic pioneer who dares to engage in scholarly debate, defending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in discussions on the “adapta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He is also an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 who integrates knowledge with action, guiding students toward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nriched education” reform. Moreover, he is an advocate for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propo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xceptional ability” schools to unleash human potential. His ideas and practices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cademic debat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enriched education; Qian Xuesen’s Question;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